

# 从红光村发掘的彩绘石磬看纪南城南郊祭祀

孙 继, 向德福

(长江大学 文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 1970年, 在距纪南城2公里处的红光村发现了一批绘有凤纹的石磬, 通过对石磬和凤纹的研究, 我们发现这批石磬与楚人的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 纪南城南郊有用于祭祀的祭坛。南郊祭祀对象是一个以祭祀至上神太一为主体, 并包括其它诸神在内的“百神”祭祀系统。2004年公布的《上博(四)·东大王泊旱》可以作为楚人南郊祭祀的明证。

[关键词] 纪南城; 南郊; 彩绘石磬; 祭祀; 东大王泊旱

[中图分类号] K87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2-0148-05

## The Southern Suburbs Sacrifice in Jinan City by Colored Chime Stone from Hongguang Countryside Excavation

SUN Ji, XIANG Defu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China)

**Abstract:** In 1970, a number of painted stone were found at a distance of 2 kilometers from Jinan city. In view of the stone and phoenix design research, we found that this lot of stone and Chu people worship are closely linked, and the sacrificial altar used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Jinan city.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ritual objects is a supreme God to sacrifice as the main body, which including other “gods” in sacrifice system. In 2004, Shanghai Museum (four), the Cambodian Kingdom Drought can be used as the evidence to Chu people who sacrifice in southern suburbs.

**Key words:** Jinan city; southern suburbs; colored chime stone; offer sacrifices to gods; Cambodian King Park Dry

1970年考古工作者在距纪南城南垣2公里处的红光村发现了一批彩绘石磬。段玉裁说:“郊之为言交也, 谓乡遂相交接之处也。”<sup>[1]</sup>《说文》曰:“距国百里为郊”, 这是郊的本义, 《尔雅》曰:“邑外谓之郊”, 这是郊的引申义, 本文“郊”取其本义, 很显然红光村属于纪南城南郊的范围。彩绘石磬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纪南城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囿于材料的限制,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内布局

上, 对纪南城郊区的研究则未见专文论述。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通过对红光村发现的彩绘石磬的研究, 对纪南城南郊祭祀场所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索。

### 一 纪南城南郊的祭祀场所

这批石磬共有25具, 发现于纪南城南约2公里的一座圆形土台之中。土台分为两层, 上层为汉

收稿日期: 2012-12-1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纪南城大遗址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规划利用研究”(111048917); 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纪南城大遗址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规划利用研究”(2012D048)

作者简介: 孙 继(1985-), 男, 湖北随州人, 长江大学学生, 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研究; 向德富(1961-), 男, 湖北仙桃人, 长江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代文化层,下层为战国文化层。石磬是在土台东北部边缘的战国文化层发现的。25 具石磬,距今仍较好的保存着彩绘花纹和略显凹凸的花纹,从第 2、5、9、10、19 等具石磬的花纹来看,花纹以 1-3 只凤鸟为主题,其余部分则用羽毛花纹填补和衬托,构成富丽多彩的画面。经有关专家检测,“大部分发音较好,音质优美,音域也相当宽广。当时实用的音,至少有 3 个 8 度左右。这批石磬,现在还能敲出悦耳的声音,用以演奏乐曲。”<sup>[2]</sup>

1. 石磬。磬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打击乐器,甲骨文作,左像悬石,右半边像手执槌敲击之状,郭沫若先生认为“其意若日以手击磬,取得之而成声”。<sup>[3]</sup>《说文》:“磬,乐石也。从石也。”《左传·襄公十一年》:“及其搏磬”,杜预注:“磬,乐器”。《礼记·明堂位注》引用《世本·作篇》“无句作磬”的记载,认为发明石磬的人是无句,现已无从考证,但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粗制的石磬。龙山文化时期的石磬目前共发现有 5 具,如 1983 年河南禹县花石乡阎砦村龙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石磬。<sup>[4]</sup>

楚国大概在西周早期就拥有并使用石磬了。《诗经·小雅·鼓钟》:“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韩说》曰:“南夷之乐曰南,四夷之乐,唯南可以和于雅者”,郑玄注:“四夷之乐,东方曰昧,南方曰任”。可见,《鼓钟》中的“南”表示地理方位,代表南夷即楚人的音乐,这时的楚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四方音乐之中只有楚音才能和西周宫廷音乐相提并论,演奏楚音时需要石磬、鼓等乐器。

在“古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乐器首要作用是祭祀,这是因为在我们先民的意识里祭神必须娱神,娱神必须有歌舞和乐舞。《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箠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明确地说明了在礼形成之初,举行乐的目的是为了“致其敬于鬼神”,先民们把歌舞和乐曲当作取悦“神”的一种手段。《九歌·东君》记载楚巫覡们载歌载舞悦神的祭祀仪式:“陋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翺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可见,石磬主要是用来祭祀的。故在楚墓中石磬经常出现,考古发现年

代最早的楚系石磬见于淅川下寺 M1、M2、M10 墓中,共有 39 具春秋早期的石磬。<sup>[5]</sup>除此之外,在淅川徐家岭 M3 墓,<sup>[6]</sup>淅川和尚岭 M1、M2 墓,<sup>[7]</sup>随州擂鼓墩 M2 墓<sup>[8]</sup>,曾侯乙墓<sup>[9]</sup>和江陵天星观 2 号等墓中亦有所发现<sup>[10]</sup>。

2. 凤纹。凤纹是楚系器具中一种常用纹饰,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绘有凤纹的楚系器物较多,例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鹿角立鹤、漆鸳鸯盒、漆盘鹿,<sup>[9]</sup>淅川和尚岭 M2 出土的嵌红铜画像铜壶,<sup>[11]</sup>以及拍马山 4 号墓出土的虎座鸟架鼓上,都绘有凤纹<sup>[12]</sup>。这些凤纹具有特定寓意。

《说文》说:“凤,神鸟也……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离骚》有:“凤皇翼其承旅兮,高翱翔之翼翼。”在楚人心目中凤是美丽的、神圣的象征,所以楚庄王自称是“不鸣则已,鸣将惊人”的凤鸟;屈原也自喻为凤:“凤皇在路兮,鸡鹜翔舞”。从纪南城南郊石磬上的凤纹来看,凤鸟体态优美,形态多样。例如,第 19 具的背面“用精练的手法勾画出凤的形象。凤昂首曲颈,冠上的羽毛大胆夸张,任意延伸,足向前作抓物状,展翅垂尾。凤的两旁,都用两组羽毛图案加以衬托,使凤的秀劲生动形象更为突出。”<sup>[2]</sup>楚人将美丽动人的凤绘在石磬上是为了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神灵,以达到“娱神”的目的。《荀子·解惑篇》引诗曰:“有凤有凰,乐于帝心”,这与上述石磬的宗教动机是一致的。

此外,凤纹与祭祀的场面有关。据文献记载,楚人祭祀时会跳一种文舞,这种文舞称“箫韶”。《离骚》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乐”,“韶”即为“箫韶”。又据《尚书·益稷》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意思是说在跳“箫韶”、奏“九歌”时,凤凰等祥兽会来集,围在舞者四周起舞。1990 年,考古工作者在淅川和尚岭 M2 发掘了一件嵌红铜画像铜壶(M2:27),其肩部绘有一个神人,神人的两侧绘有一对相背的凤鸟。这幅画正是描绘了祭祀时“凤凰来仪”的画面。<sup>[13]</sup>所以,我们认为纪南城石磬彩绘画像的四周充满着羽毛,用羽毛代表凤凰,其实表达了楚人奏“九歌”、舞“箫韶”招引凤凰来集的祭祀场面。

最后,凤还是楚巫覡通天的重要工具。张光直先生在论述青铜器上的动物图案时认为,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巫呈现通天工具的一个重要部分,其

他原料的艺术品上面的动物纹样,也应该有同样的作用,也是巫觋通天工具的一部分。<sup>[14]</sup>这一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先秦时期,凤是楚巫觋灵魂通天升天的重要工具之一,《离骚》:“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这句话描写的正是主人公令凤鸟导引灵魂飞登九天的画面。张正明先生更是直言:“楚人认为,只有在凤的引导下,人的精灵才得以飞登九天周游八极。”<sup>[15]9</sup>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石磬还是从凤纹考虑,红光村出土的25具彩绘石磬都与楚人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我们可以推断,纪南城南郊有祭祀场。郭德维先生在《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中根据纪南城的整体布局和出土文物,推断南郊“可能还有重要的祭祀场所……是楚国贵族的活动场所之一”。<sup>[16]87</sup>曲英杰先生也持此观点:“纪南城南约2公里的圆形土台……或即为祭楚之分野翼、轸宿内诸星之遗存。”<sup>[17]</sup>这样看来,纪南城南郊有祭祀场所似乎是不容质疑的。

## 二 南郊祭祀场的祭祀对象

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相信有众多的神灵存在,楚昭王时期的大夫观射父称其为“百神”,“其谁不敢战战兢兢,以事百神”;至战国晚期屈原在《离骚》中仍说:“百神翳其备降兮,九嶷缤其并迎”。在楚人“百神”体系中,太一神被奉为至上神,《九歌》中有“东皇太一”篇,王逸题解说:“太一,星名,天之尊神。”《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同记亳人谬忌向汉武帝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一牢。”其中“古者天子”很明显不可能是指刘邦,也不是周天子,因为周天子祭祀的是天神。祭祀“太一”的只有楚人,这里的天子只可能是楚君。

包山楚简215:“太一、后土、司祸、大水、二天子、坐山皆既成。”<sup>[18]225</sup>“城”读为“成”,指完成祭祀,又见简202反:“新父既成,新母既成。”<sup>[18]210</sup>大致的意思是说对太一、后土、司祸、大水、二天子、坐山的祭祀都已经完成。简215中太一神处在祭祀的首要位置,说明了太一神的至上神地位,但太一神和其他诸神在受祭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在楚人看来,至上神仅仅“意味着在祭祀的时候受到最

隆重的礼遇而已,至上神和其他诸神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关系和制约机制”。<sup>[19]</sup>如包山简212:“赛祷太,备玉一环;后土、司命、司祸,各一少环。”<sup>[18]225</sup>因此,纪南城南郊祭祀对象是一个以祭祀至上神太一为主体,并包括其它诸神在内的“百神”祭祀系统。

直接反映太一神和其他诸神关系的值得注意的出土资料是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太一将行”图》。该帛书有“神社图”、“神祇图”、“避兵图”、“太一避兵图”等称呼,陈松长先生提倡称之为“太一将行图”似乎更为合理。<sup>[20]</sup>该图分布在43.5厘米×45厘米的帛布上,神象分为上、中、下三层,全图有总题记,各神像并附有题记。太一神在上层的正中间,胯下有一条龙,右边是“雨币(师)”,左边是“雷公”。在太一的左下方和右下方各有二神;下层,位于太一左右方各有一条龙,左方是黄龙,右方是青龙。很明显,全图以太一神为核心,体现了太一至高的地位,但和诸神位置是和谐共处的。

然而,楚国公族是尚东的,这一点在文献和考古资料中都有稽可考。《新序》卷一描写楚人接待宾客的场景,“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上位东面”就是坐西面东。迄今发掘的楚国大型楚墓,除了天星观1、2号墓之外,一概向东。如淅川下寺2号,墓主官至令尹,头部向东。<sup>[21]</sup>尚东的习俗在楚国灭亡之后得到了保留,《史记·项羽本纪》记鸿门宴“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样看来,楚人的祭祀应该以东郊为主,为什么在南郊会发现祭祀场呢?

首先,从礼制来看。《礼记·郊特牲》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这就要求郊祀之地是阳光非常充足的地方,正所谓“兆于南郊,就阳地也”。南向被认为是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在南郊建立祭祀场也就顺理成章。就现有的考古资料看,东周时各诸侯国在国都的南郊的确建有祭祀场。如新田古城,考古工作者在新田古城(牛村古城)南面约半公里的郊区发现了用于郊祀的兽坑群。<sup>[22]</sup>同样,考古工作者在曲阜故城正南1735米处也发现了雩坛,是主要用于求雨的祭祀场。<sup>[23]</sup>鲁僖公为了到南郊祭祀还扩建了南门,《左传·僖公二十年》载:“春新作南门”。杜预注:“鲁城南门

也。本名稷门,僖公更大之。”

其次,从纪南城的整体布局来看。宫殿区位于城中部偏南,在城内东南角是贵族居住区,在南垣东部还有城门可到达南郊,宫城坐北朝南,宫门通向南城门。《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就是国都。又曰:“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郭德维先生根据现在已发现的城门布局和文献资料推断,城内的大道应该成井字型,四周还有环城大道与井字大道相交,构成一个便利的交通网。<sup>[16]33</sup>祭祀场是为贵族服务的,纪城南郊祭祀场接近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正是为了满足贵族的祭祀需求。便利的交通网,方便了贵族们出城祭祀。

最后,从纪南城人口分布来看。纪城北有纪山,东临海子湖,西有八岭山,唯有南郊地势平坦,平原面积大,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优越的自然环境促使人口向南郊转移和增长。考古资料也证明南郊人口众多、密度大。距纪南城5公里范围以内,目前发现的墓葬主要以有封土或没有封土的小型墓为主,这些墓葬大概是楚国下层贵族或平民的墓葬。其中南郊最为集中,如荆州砖瓦厂(三红)、傅家台、张家山、西峨山、太晖观、太湖港、李家台以及东南部的鸡公山、岳山等。<sup>[16]270</sup>可见,南郊建立祭祀场满足了下层贵族和平民祭祀的需求。

### 三 《柬大王泊旱》中楚人南郊祭祀的明证

上文对纪城南郊祭祀场及其祭祀对象进行详细的讨论,遗憾的是,传世文献中并未找到楚人在南郊祭祀的实证。2004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简称《上博四》)的出版弥补了这一遗憾。《柬大王泊旱》是《上博四》中的重要一篇,对研究楚国的祭祀制度和官职有着重要意义,故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全文共有23枚简,总字数601字,主要叙述了楚国遭逢旱灾,楚简王和大臣对祭祀夏水的争议。

柬(简)大王泊(被)旱,命龜尹罗贞于大夏,王自临卜。王向日而立,王汗至(简1)带。龜尹知王之庶(炙)于日而病,盖幹愈夭。釐尹知王之病,乘龜尹速卜(2)高山深溪。王以问釐尹高:“不穀骚甚病,骤梦高山深溪。吾所得(8)城于宇中者,无有名

山名溪。欲祭于楚邦者乎?尚而卜之于(3)大夏。如食,将祭之。”(4)<sup>[24]119-135</sup>

“柬”同“简”,“柬大王”同见于望山一号墓10号简<sup>[25]</sup>和清华简《楚居》15号简<sup>[26]</sup>,指楚惠王之子楚简王,《史记·楚世家》:“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简王中立”,“二十四年,简王卒。”公元前431年和公元前408年在位,属于战国早期。

大夏,水名,指夏水。冠“大”字表示尊崇。夏水亦见于《鄂君启节?舟节》:“逾汉,庚黄,逾夏,内入。”<sup>[27]</sup>《楚辞·九章·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洪兴祖《补注》引《水经》:“夏水出江,流于江陵县东南”应韶曰:“沔水自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据此知夏水故道从今沙市东南分长江东出,经监利县北,折东北至沔阳县附近入汉水,夏水在纪南城东南。故楚简王贞卜于夏水的位置是在南郊。

釐尹知王之病,乘龜尹速卜高山深溪。原释者断句为“釐尹知王之病乘,龜尹速卜高山深溪。”<sup>[28]</sup>工藤加男教授从之,释“乘”为“胜”,<sup>[29]</sup>意思是说釐尹知道简王的病痛越来越严重,龜尹立即卜问高山深溪。周凤五先生认为“乘”升也、登也,<sup>[24]119-135</sup>意为釐尹知道简王疲累,请龜尹赶快登坛卜问高山深溪。从这句话来看,周先生的解释似乎更符合逻辑。“乘”升也、登也。《诗经·豳风·七月》:“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毛《传》:“乘,升也。”动作“登”的对象只可能是祭坛,先秦时期,崇祭要筑坛。《周礼·地官·堂正》:“春秋崇祭亦如之。”郑玄注曰:“崇,谓雩崇水旱之神,盖亦为坛位如祭社稷云。”《周礼·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圆丘奏之,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则地示皆出。”《论语·颜渊》:“襄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包咸注云:“舞雩之处有坛,故可下游焉。”可见,楚人占卜时要筑坛,在坛上进行占卜活动,这正好与彩绘石磬发现于圆形土台相吻合,并与上文所举曲阜故城南郊的雩坛相佐证。

那么,这句话大致意思就可以明白了:楚国大旱,简王怀疑是纪城南面的夏水在作祟,命龜尹罗贞卜夏水,看是不是夏水作祟,如果是就祭祀它。整个占卜活动在南郊的祭坛上举行,由龜尹罗主持,简王亲自监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战国时期,楚都纪南城南郊有用于祭祀的祭坛,这时候的楚人虽仍受传统“东向”观念的影响,但他们更加注重祭祀场的实用性和便利性,将祭祀场建在人口稠密的南郊更符合纪南城的城市规划和人口分布,方便了贵族和平民的祭祀。楚人南郊祭祀的对象其实是一个庞杂的“百神”系统,这个系统以至上神太一为主体,并包括其它诸神在内。

### 参考文献:

- [1] 段玉裁. 四与顾千里书论学制备忘之记[M]//经韵楼集卷十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14.
- [2] 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江陵发现的楚国彩绘石磬及其相关问题[J]. 考古,1972(3).
- [3] 郭沫若. 甲骨文字研究:释和言[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
- [4] 匡瑜,姜涛. 禹县阎砦村龙山遗址.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4[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26.
-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浙川下寺春秋楚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6] 曹桂岑,李胜利. 浙川徐家岭楚墓.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1[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28.
- [7] 胡永庆,许天申. 浙川县和尚岭春秋及西汉墓.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1[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29.
- [8] 湖北省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 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85(1).
- [9] 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10] 荆州市博物馆. 湖北省荆州市大星观二号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1(9).
- [1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浙川县博物馆. 浙川县和尚岭春秋楚墓的发掘[J]. 华夏考古,1992(3).
- [12] 荆州市博物馆. 江陵葛陂寺和拍马山战国墓的发掘[J]. 文物,1964(9).
- [13] 李琴. 试析浙川和尚岭出土的一件嵌红铜画像铜壶[C]//楚文化研究论集:第6集.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28.
- [14] 张光直. 考古学专题六讲[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98.
- [15] 张正明. 楚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16] 郭德维. 楚都纪南城复原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 [17] 曲英杰. 史记都城考[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20.
- [18] 刘信芳. 包山楚简解诂[M]. 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
- [19] 徐文武. 楚国宗教概论[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18.
- [20] 陈松长. 帛书史话——中华文明史话[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64.
- [21] 张正明. 秦与楚[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8.
- [22] 李永敏. 晋都新田的祭祀遗址[J]. 文物世界,2000(5).
- [23]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 曲阜鲁国故城[M]. 济南:齐鲁书社,1982.
- [24] 周凤五. 楚上博四《柬大王泊旱》重探[C]//简帛:第一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2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 望山楚简[M]. 北京:中华书局,1995:69.
- [26]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简(一)[M]. 上海:中西书局,2010:182.
- [27] 刘和惠. 鄂君启节新探[J]. 考古与文物,1982(5).
- [28] 马承源. 清华大学馆藏战国楚竹简(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6.
- [29] 工藤加男. 楚文化圈所见卜筮祭祷习俗——以上博简《柬大王泊旱》为中心//简帛:第一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骆晓会